

董仲舒的亡灵救不了林彪的命

哲学系工宣队员 杨世雄

历史上一切搞“奉天法古”、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都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由于他们内心极端空虚，只好请出历史的亡灵，抬出孔孟之道，作为他们搞反革命复辟的精神支柱。林彪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并作为他“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大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反党野心家，为了实现他篡权复辟的罪恶阴谋，他口念“政变经”，做着皇帝梦，阴阳怪气地叫嚣：“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其目的就在于企图借董仲舒之魂，还资本主义之尸，以统一思想之名，搞篡党夺权之实，便于他用董仲舒所炮制的“四条绳索”，来搞反革命政变，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的世袭王朝。然而“历史的车轮是拖不回来的”。董仲舒的亡灵，丝毫救不了林彪一伙的命，最多只不过向我们提供了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反面教材罢了。

董仲舒是什么人？他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死于公元前一〇四年，是汉武帝时代的反动思想家。他以恶毒攻击秦始皇、对法家路线进行反攻倒算，大肆宣扬孔孟之道起家，得到了汉武帝的信用。经过他向汉武帝建议“表章六经”，“独尊儒术”，并经过他发展了的孔孟儒家的反动学说，开始为走向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以后长期封建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一直把董仲舒吹捧为“儒家正宗”。

董仲舒为什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反动主张？汉武帝又为什么采纳他的主张而加以实行？对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从秦统一到汉初几十年，经过了一次秦末农民大起义；又经过秦汉之际到汉代初年，封建地主阶级和奴隶主残余势力之间的多次较量，展开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到汉武帝时，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得到了巩固。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历史地位已经转化，面临着的已是农民革命的巨大威胁。汉王朝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已促使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日益尖锐化。汉武帝时，农民的反抗和起义已经象地震一样地摇撼着整个封建统治。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这时，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汉王朝封建统治者，逐步从真老虎变为纸老虎，开始从一个新兴的进步阶级向反面转化。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除了用严刑酷法来镇压劳动人民外，还需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正当这时，政治投机分子董仲舒跳了出来，在汉武帝面前，出谋献策。说什么孔丘著《春秋》，强调了西周奴隶主一统天下的治统和法统，是天经地义的原则，古今一贯的道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对策》三）。他所鼓吹的什么“《春秋》大一统”，也就是剥削阶级专政的一贯的统治原则。董仲舒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抬出了孔老二这具僵尸，给他涂上五光十色的油彩，加以美化歌颂；同时也就把法家的进步思想路线，斥之为“邪辟之说”而加以排斥。他声称只有把一切主张革新、要求进步的学派完全打下去，把孔孟儒家学说定为一尊，然后汉王朝的统治才能巩固。这充分表明了董仲舒是孔孟儒家的吹鼓手，是仇视和绞杀一切进步思想的刽子手，他所要维护和建立的“统纪”、“法度”，就是奴隶主、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血腥统治。林彪狂热地吹捧董仲舒，可见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混进我们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

董仲舒为了给反动的地主阶级提供统治的理论根据，以毕生的精力搞复活孔孟之道的活动，与法家的思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

法家认为：天是自然的天，有其本身的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天命不足畏”。这就直接否认了孔孟所鼓吹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但在董仲舒看来，这却是“邪说”，是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他把神权和皇权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反动理论。在他看来，天不是自然的天，“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就是说，天是有意志、有目的地安排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这样，他就按照地上皇权的需要，炮制出了一条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天上的“神权”。林彪尊儒反法，吹捧董仲舒，其

思想实质是，为他的反党思想纲领“天才论”寻找思想根据。他根据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的反动说教，妄图让人们相信他的“受于天”的脑袋“特别灵”，是天生的“至贵”、超人，是主宰历史的“巨匠”，任凭他们这些“天马”“独往独来”，篡党夺权，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独裁统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妄图“天马行空”的小丑，只会落得苍蝇碰壁的可耻下场。

在法家看来，社会是发展的，历史是前进的，政治制度也是随时势的需要而变化的。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韩非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都坚持“厚今薄古”。董仲舒则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奉天法古”的政治观，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他看来，天是永恒不变的。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剥削者“受命于天”，具有“圣人之性”，所以永远“立于生杀之位”；而劳动人民则是天生的“斗筭之性”，只能忍受宰割奴役，而不能稍有反抗。人民若是反抗，就是违反了天的“意志”，应该受到代天执行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的镇压。这就叫“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这样，他又在劳动人民头上套上了第二条绳索——政权神授的观念。林彪歌颂董仲舒，其又一个用心就是借董仲舒的“政权”观来为自己的篡党夺权的目的服务。他学着董仲舒的“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的腔调，狂叫“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他认为，只要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先发制人”地“夺取全国政权”，就可以对被诬蔑为只会“搞米”、“搞钱”的“斗筭之民”实行“严厉镇压”。林彪唤起董仲舒的亡灵，目的就在为他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专政造反

革命舆论。

董仲舒根据他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胡说什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用所谓“天尊地卑”，“阳贵阴贱”，来论证“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隶属关系，明确提出了“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把它说成是“天意”的安排。这样，他利用神权，配合政权，又把按封建宗法关系所规定的“父权（族权）”以及“夫权”两条绳索紧紧地套在人民的头上。林彪梦寐以求要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法西斯王朝，也就是把“三纲”奉为信条。因此，他吹捧董仲舒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董仲舒的整个思想体系，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他发挥孔孟之道，炮制四条绳索，不仅是汉王朝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而且是以后长期封建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奴役和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精神桎梏。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在中国，“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今天，林彪又抬出董仲舒的这具僵尸，别有用心地叫嚷“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这充分表明林彪的反动思想体系同孔孟之道的血缘关系。他出于搞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十分向往汉武帝和董仲舒之间主倡奴和的关系。他一心想当“国家的头”，要“指挥一

切”，“调动一切”，因而急切地需要董仲舒一类的人物出来，独尊林术，罢黜别家，对他恶毒攻击为“黑话”、“半黑话”的马列主义一家，要实行“共诛”、“共讨”，“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以便树立他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林彪自比奴隶主头子“文王”，并把文王向其子武王传授统治经验的遗嘱作为教子经，妄图建立林家父子的家天下。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的“忠”字经，被他作为搜罗牛鬼蛇神、组织反革命队伍的“求贤诏”。他的那一小撮死党，果然无耻提出“忠于”林彪的反动口号，并以此作为“大节”。他们三跪九叩，立书宣誓，表示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一家。林彪及其死党一唱一和地吹捧董仲舒，正是他们反革命肮脏灵魂的自我大暴露。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流血斗争，终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砸碎了捆在身上的“四条绳索”，摧毁了董仲舒之流开设了两千多年的孔家黑店。我们工农兵用伟大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代表了不甘心失败的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开历史倒车，搞反革命复辟。他们心劳日拙地摆出孔老二的破烂，又祭起董仲舒的亡灵。这一切，都丝毫挽救不了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这是因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这就是历史的结论。